

总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
阶级自由化教育骨干培训班材料



2 020 6925 1

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五个辅导报告

总参谋部政治部宣传部

一九八七年三月

说 明

总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教育骨干培训班在京举办期间，我们请中宣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党校和《红旗》杂志的有关专家、教授，围绕当前一些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培训班、总参党委和总参各部局党委中心组成员作了五个专题辅导报告。这些报告已经本人审阅，可供各单位在教育中参考。

装甲兵工程学院政教室和工程兵部、通信部、总参干部轮训班的有关同志参加了报告录音的文字整理工作。

总参政治部宣传部

一九八七年三月三日



目 录

1. 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几个问题
.....中宣部理论局长卢之超 (1)
2. 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
.....中央党校理论部副主任、教授赵曜 (26)
3. 关于民主和自由问题.....《红旗》杂志编委吴建国 (45)
4. 关于坚持党的领导的几个认识问题
.....中央党校党的领导教研室主任、副教授蔡长水 (71)
5. 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
.....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研究员段若非 (93)

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几个问题

卢 之 超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我党今年的一件大事。这个问题全党都在学习，我自己也在学习；现在只就自己的学习体会，讲四个问题。

一、中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是今年一件大事，并要长期进行下去。

这个任务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同志们都知道，去年年底，全国许多城市的学潮，性质是很严重的，但更严重的是在于学潮向全党全国人民暴露一个问题：这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和我们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软弱混乱。这次学潮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是近几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发展，而我们的一些领导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问题上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造成的一种结果。

我们党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斗争，可以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开始了。一方面，党中央、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抵制、发展，以至于泛滥。而从中央到地方的思想战线某些领导同志软弱涣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里面有个过程，我想介绍一下历史情况，分为几个大的阶段讲。

第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提出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条路线本身就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也就是紫

阳同志讲的两个基本点。按小平同志概括的说法就是他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讲的：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我的理解，第一句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我们立国、治国的基础；后一句话就是要纠正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为此就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搞活这一系列方针政策。这两方面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而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小平同志强调指出：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这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

在三中全会的同时和以后不久，就面临着一个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其表现，从社会上讲就是西单的“民主墙”和一些地方陆续发生的动乱迹象。“民主墙”提出的一些口号和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学生闹事提出的口号差不多。民主、自由、人权啊，共产党能不能领导啊，社会主义好不好啊，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错误的根源，等等，直接针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思想。跟这个民主墙有关系的，还有这个地方的学生，那个地方的工人要请愿、要上街等影响安定团结的迹象，不过没有象去年这种集中闹的情况。从党内来讲，当时正在开理论务虚会。这个会主要是进行拨乱反正，批判、认识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前“左”的理论错误。但是，在会上也有少数同志提出了一些违反马列主义的思想观点。这些观点也是围绕四项基本原则的，与现在不同的是作为理论观点提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搞早了；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该不该搞？有些抽象民主自由的观点也提出来了。在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评价问题上，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

革命中的错误大家提出来批评、提高认识，这是对的，但也有一种企图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历史地位的倾向，好象毛主席一开始就是不对的，说他的思想是农民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总之，在这个时候就表现出一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倾向。

正是由于党内外这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苗头，小平同志于1979年3月30日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全面系统论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和重要性。小平同志说，为什么要强调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呢？因为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危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方针政策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中有极少数人散布怀疑、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就象我前面讲的西单“民主墙”一类的活动。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小平同志讲，虽然这种人在党内外都是极少数，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是极少数而忽视他们的作用。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这是第一回合，或第一次斗争，即在三中全会同时或刚开完，有些人（包括党内外）趁我们纠正过去“左”的错误，拨乱反正的时候，想来“纠正”社会主义，“纠正”马列主义。

从小平同志这个讲话以后，即从1979年至1981年为另一阶段。1979年以后，由于小平同志的讲话和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取消“四大”，社会上逐步安定下来。具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有的有了改变，发现自己的讲法不对；有的没有怎么改变，但也谨慎了一些；有的根本没有改变，以后又逐步暴露出来。我说没有解决，是指有些人对一些理论问题并没有服气。比如，小平

同志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后，理论界有些同志就借这个题写文章，说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坚持什么样的人民民主专政，连续写了四篇文章。看起来是解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提问题。意思是说，我们要坚持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的社会主义，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啊？一直到后来，方励之、刘宾雁还是这个逻辑，说现在我们对什么是真社会主义、什么是假社会主义搞不清楚。意思是你既然搞不清楚还坚持什么东西啊！实际上是把这四个坚持推回去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首先我们要承认社会主义在中国是个现实，它有本质的规定性。比如讲，公有制为主体、总体上是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制度、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政权，这不都是十分确定的吗！至于在具体体制和作法上，当然还不完全清楚，需要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但不能因此就说社会主义是真的还是假的搞不清楚。在这中间，还有两种情况：一是社会上有些问题不时还在暴露，特别是有些非法刊物和非法活动。报刊上也有些脱离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所以，1981年党中央发了有关禁止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指示和关于报刊广播宣传的决定。二是理论上的问题。1980年初，我们党开始起草和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进一步拨乱反正，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总结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教训，作为当时的一个重要任务。这时，理论界也在研究总结历史经验，但有的是从右的方向来总结的。在文艺界也有这种情况：比较集中的表现就是说五七年后我们党犯了许多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更大的错误，社会主义遭到许多曲折。然后就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到根本否定我们这个党，丑化党，丑化社会主义。他们说，共产党就是没干什么好事情，全是整人，造了许多冤案，社会主义就是来回折腾。他们用这种方法丑化

党、丑化社会主义。当时有首诗《将军不能这样做》，从这首诗看共产党的干部简直糟透了。还有些人到处讲话、演讲，开座谈会发表意见。集中的一个表现就是《苦恋》，和根据这个小说拍的《太阳与人》那个电影。小平同志讲，看了这部电影后，给人的印象就是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在理论界，当时还有一个观点，说中国革命实际是搞农业社会主义，是农民思想。有的说得更厉害，说这种思想在社会上起的是反动作用，这连我们的民主革命都否定了。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总结历史经验的。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我们既肯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以及毛泽东思想丰富的内容；同时也指出毛主席晚年一些观点上和作法上的错误，把这两者区分开来。但有的人是抓住毛主席晚年的一些错误，从而整个否定毛泽东思想。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也有这种情况。1981年夏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决议起草、讨论过程中，有许多争论、许多思想斗争。决议公布后，一些问题在一部分同志中并没有完全解决。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小平同志又于1981年7月作了《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小平同志说：“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的领导是有显著成绩的，这要肯定。工作中也存在着某些简单化和粗暴的倾向，这也不能否认和忽视。但是，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接着他又讲：现在“在一些青年作家和中年作家中间，确实存在着一种不好的倾向，这种倾向又在影响着一批青年读者、观众和听众。坚持社会主义立场的老作家有责任团结一致，带好新一代，否则就会使矛盾激化，会出大乱子。总之，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

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无政府状态。”当时，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一是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二是思想战线软弱无力。自由化和软弱无力的一个表现就是对错误的倾向不能批评。一批评，被批评的人反而到处受到吹捧、同情，而批评的人则受到围攻。这个现象以后几年一直没有解决。举个例子，《解放军报》曾写了一篇文章，在全国第一个批判《苦恋》。尽管这篇文章写得有缺点、有毛病，也就是小平同志讲的，有某些简单化和粗暴的倾向，有些用语不太适当，有些分析说理也不太够，但总的看，它批评这种倾向该不该？基本方向对不对？把这根本是非的问题放在一边不谈，而只说这篇文章写得怎么不好，这就走向片面了。所以后来小平同志出来讲话，说《苦恋》应该批评，如果这篇文章批评说理还不够，作者写出说理更好的文章来批评嘛！根据小平同志的提议，1981年8月召开思想战线座谈会，座谈会上讨论和批评了自由化和软弱无力的现象。以上可以说是第二个阶段。

在这以后开始筹备十二大，到1982年9月召开了十二大。十二大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战线总的情况还比较好。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有很多问题虽然没有解决，但表现谨慎一点，收敛一点了。

但是，这种自由化思潮，从小平同志讲话到思想战线座谈会都没有根本解决，怀疑、动摇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还是陆续表现出来。有的人讲民主自由，一直讲到反革命言论可以公开发表。有的把党的领导 and 民主对立起来。比如说党的领导从历史上看是经常犯错误的，党的领导正确我就服从。这个抽象讲好象也对，可具体来说，党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如果任何组织和报刊，认为党的领导不正确，就代表人民否定党的领导，每个人都成了真理的判断者，那么，我们党又

怎样实行民主集中制？实际上这就是认为我比你党中央高明，我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你有时代表，有时就不代表。还有理论务虚会上提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否搞早了，该不该搞社会主义，能不能搞社会主义？这一类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另外，还有新产生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搞活的发展，产生了“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在文艺界和文化生活方面出现了许多低级庸俗的东西。这种自由化或错误的思想倾向，在两次受到批评后，从两个方面继续发展：一方面是在比较抽象的理论领域。当时的表现就是有的很有兴趣研究抽象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道主义的问题从1980年就开始讨论了。开始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作法和林彪、“四人帮”摧残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等罪行。这一点大家的意见一致，要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但在理论上逐步发生了分歧。有的用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抽象讲人的自由、人的权利；特别是表现在异化问题上，说社会主义不断产生异化，社会主义的干部、各级领导，人民要他们来为人民服务，他们是人民的公仆，但在现一个个都变成了社会的主人了，把老百姓变成了他们的奴隶。经济上搞生产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的，结果搞了许多蠢事，把人民创造的财富浪费掉了，人民仍然很穷等等，所以是异化了。另一方面，就是文艺、文化生活方面出现许多低级庸俗的东西，污染人们灵魂，弄坏了社会风气。当时一些录相、小报、演出，搞得很庸俗。这和“一切向钱看”是连在一起的，不是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而是到处散布低级的、不健康的東西。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小平同志认为思想座谈会以后，收到一些效果，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所以在1983年二中全会上，在决定整党的同时，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问题。小平同志发表了《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的讲话。他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

是整党不要走过场；一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个讲话集中批判了抽象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的观点。同时也指出前几年一些错误的思想仍没有解决。小平同志讲，有一些同志热衷抽象地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同时讲，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一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比较集中地指政治思想方面，就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也可以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精神污染的核心部分。反对精神污染开始起了一些作用，中间也发生过一些毛病，如一些地方和单位，因为政策界限不太清楚，把一些不属于精神污染的现象，例如，关于人们生活上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头发，等等，也干涉了。有些地方对有些问题的批评有些简单化。但这些现象中央发现后很快就制止了。当时中宣部讲了许多话，划清了界限。但是，有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的人，抓住这些毛病就搞反攻，有些对反精神污染采取消极态度的领导，也抓住这些问题指责反精神污染，从党内到党外对反精神污染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以至最后讲，以后反对精神污染不要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了。社会上传得就更多了，说什么搞了二十八天的小文革，反精神污染怎么怎么糟糕啊，把当时响应中央号召，写了一些批判精神污染文章的同志说成是清污分子，使他们受到孤立，还有许多流言、谣言和人身攻击。就这样，小平同志提出的反对精神污染这个思想战线上很重要的口号，在很短时间就被各种借口给否定了。否定的结果，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更加严重发展。这可以说是第三个阶段，即从1981年思想战线座谈会到1983年反对精神污染这一段。

第四阶段，在全盘否定反精神污染之后，自由化的思潮进一步发

展。第一件事情是1984年底，召开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准备期间和会议以后，文艺界有些同志借口创作自由，否定反精神污染，在文艺上、理论上也搞了一阵子自由化。但当时的影响还并不是在社会上，主要在文艺界和理论界部分同志中。可这一段搞得很厉害，认为提出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也不对。有一篇文章，说什么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不对，现在右的问题根本就不应该提，我们全部力量应该反“左”。就这样的文章还登到人民日报上了。接着就攻击精神污染这件事，攻击得非常厉害，说什么谎报军情啊，这个运动（实际上不是运动）是民族的耻辱。甚至破口大骂。这种情况延续不太长，因为有些话说得太不象话了，所以中央很快提出批评。1985年3月，小平同志提出要加强理想、纪律教育，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接着，小平同志一再讲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到1985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小平、陈云、先念几位老同志集中谈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同时指出，十二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后，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没有取得很理想的效果，主要是党没有引起重视；他们针对当时存在的各种消极现象，要求全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小平同志还特别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防止迷失方向。这一段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又一次受到中央的批评，所以1985年看起来思想战线上的形势还比较好。党代会以后大家很高兴。可高兴的时间不长，到1986年春天，就提出“三宽”，即宽松、宽容、宽厚。这“三宽”抽象讲没有什么，但是有两个问题：一是在什么情况下讲，在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下，不强调批评，只讲宽松，只能使错误的东西更泛滥，讲宽松、宽容？如果这样，我们思想战线怎么得了。接着，在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的时候，有人歪曲“双百”方针，说“双百”

方针不能有任何前提，你一提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能实行“双百”方针了。有的说马克思人是一家，反马克思主义也是一家，讲马克思主义指导还怎么争鸣呀，等等。

当时还创造了一些事件，比如马丁事件。有个年青人，叫马丁，写了一篇文章，内容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有的问题讲得对，有的问题语得不对，是比较一般的一篇文章，有些错误。这篇文章后来登到《北京周报》上，外国人又加以转述，美国的“中报”就此发表一个评论。然后新华社把外国的反映又转过来。说马丁文章说明中国经济学界有人食洋不化。新华社把这个评论反映回来，当时有几位领导批示要研究一下。有人就借此做了许多文章，说新华社反映的不真实，领导不该批示，以至说反映一些问题是谎报军情，又要打棍子、又要整人了、又要搞运动了等等。这种议论国外报社和记者又借此造谣说这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等等。就这样人为地创造了一场风波。目的是什么？就是你不能反映思想理论界自由化的倾向，谁反映了就是抓辫子打棍子。领导更不能说话，更不要说批评、批判了。还有一件事，《红旗》杂志登了一篇文章，在文艺理论问题上批评一个同志，这本来是很正常的现象，可也造成一场风波，说什么左棍举起来又要打人啦，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捅到香港，又变成什么中共权力斗争啦，这给写文章的同志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总之，当时要批评自由化，批评错误观点确实很困难。

当时小平同志提出要考虑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我们全面改革中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应当很好地调查研究，慎重地、有步骤地进行。但有人很快接过这个口号，在报纸上在各地开的许多讨论会上，发表了很多直接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要求我们全盘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鼓吹三权分立、鼓吹多党制，说共产党一个党的领导必然腐化，

等等，自由化思潮泛滥到空前程度，从而直接发展到学生闹事。从整个过程看，这是最后一个阶段。

从这个简单的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出这么几个问题：一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存在的。有的人就是不承认，说哪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点错误言论有什么了不起呀！实际上，这种思潮不仅存在，而且从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了，几年来，愈演愈烈，越来越发展。所以中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把它作为今年的一件大事，而且要长期进行下去；二是在党的领导上、在思想战线上几年来确实存在一种软弱涣散、软弱混乱的现象。但有些同志确实是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甚至存在着如小平同志1979年讲的那样，对这种思潮的某种程度的同情和支持，一直到纵容和保护。这是自由化不断发展、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去年的事实证明，这个问题确实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和国家前途，关系到整个青年一代的前途。

第一个问题就谈这段历史回顾。如果粗略讲是两年一次大的斗争。1979年提出四项基本原则，1981年思想战线座谈会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批评丑化党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批评《苦恋》，1983年提出反对精神污染，1985年从小平同志3月7日讲话到党代表会议的讲话，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7年是更大的一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

资产阶级自由作为社会政治思潮，总是为一部分人所拥护所赞成，代表一部分人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利益。作为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的确是极少数。他们公开批判的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他们明显地集中表达了这种思潮的主要内容。但不同程度的存在这种思想倾向的人，决不只是这三个人，至于受这种思潮影响的就更



多，包括很多青年学生，所以要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它的实质。那么，这种思潮的实质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核心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明确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问题。但在这同时，还存在着同这种自由化观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各种错误思想理论观点，如宣传和盲目崇拜西方的哲学思潮、经济学思潮，宣扬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宣扬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向钱看等，这些思想观点都是错误的，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但是，这些世界观、人生观上的一些错误观点，如果没有直接涉及到社会主义、党的领导等政治原则问题，也都叫自由化思潮，那我们就扩大化了，这是不合适的。但是反过来说，讲这些观点与自由化思潮没有关系，那也不对。因为这些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错误理论、腐朽思想，实际上是自由化思潮的思想理论依据，或者说是它的土壤、条件。

从去年自由化的泛滥和学潮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看，自由化思潮对四项基本原则，可以说是全面的否定。他们不同意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党立国和各项政策的基础，有的说百家争鸣就应有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一起来争鸣，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无法贯彻百家争鸣。这是理论界提出的，学潮中更加明显，说四个坚持是中国意识形态的牢笼，有了四个坚持，中国的意识形态就在牢笼里解放不出来，活跃不起来。有人建议把四项原则改为四项提倡，不应该成为宪法和党章规定的政治原则。有人还讲，四项基本原则是写在宪法的预言里的，没有写到正文里，所以没有法律效力，不一定每个公民都要遵守。总之，他们用各种办法来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下面，我们分开来讲同四项原则对立的自由化观点。

关于社会主义道路。分几个方面介绍：首先，说什么是什么社会主义，什么是真社会主义、什么是假社会主义，搞不清。刘宾雁讲，苏联建国69周年了，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实际上还未搞清楚。有人问方励之：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哪一个更适合中国情况？他说，我认为这两个制度的解释是多元化的，概念不清楚，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所以我只能说古典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不行的。他认为古典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解释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在根本不是那个样子了。王若望也讲，我们的社会主义概念是模糊的，不清楚的。总之，我们坚持的是什么社会主义，搞不清。搞不清你还坚持什么。这是他们否定社会主义的一个办法。第二、他们讲我们国家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发生了很多异化，政治上异化、经济上异化、思想上也异化了。再就是讲我们搞的是小生产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王若望说得更清楚，他说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是虚幻的，不过涂上了一层马克思主义色彩。第三，他们说，中国根本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要搞资本主义的补课。有人讲，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说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阶段，你们认为是个大突破，是个发展，实际上这是羞羞答答的，不应讲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应该讲资本主义才是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国家想逾越资本主义阶段，这是不对的，回过头来我们应该搞资本主义。方励之等人还说，不是你们理论上承认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过程，一百年有高潮有低潮吗，低潮就是失败，不成功，至少是比不上其他国家文明的发展。世界上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在往前发展，苏联、东欧加上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落在后头的。这就是说，不要说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现在所有社会主义都没有优越性。这就把社会主义全盘否定了。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他们丑化人民民主专政，把它说成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人民实际上未得到权利。说中国政治体制是在暴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极端集权的结构，1949年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封建意识斯大林的独裁主义政治，而集权制必然导致政府腐败，人民遭受精神甚至肉体的压迫。所以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进行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不解决这个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就是空谈。还说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十多年，最高国家权力实际上掌握在个人手中，这正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他们把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和几千年来来的政治体制说成一样，无非是丑化我们的政治体制是独裁的、不民主的，从而为他们的所谓“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制造理论根据，为他们搞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制造借口。

关于民主、自由、人权问题，我想多说几句。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提出过民主、自由、人权等口号，在历史上确实起过进步作用。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观点就有原则区别。资产阶级是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的，最典型的是天赋人权论，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有人权，这是天赋的，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人权、自由、民主等等都是在历史上发展着的，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政治要求，这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一种结果。当然，资本主义那一套民主制度，在某些形式上我们还是要吸取的。如宪法、选举、代议制等等都是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主义过程中创造的，无产阶级对这些东西是要有分析、有批判的吸取。而现在搞自由化的人是主张全盘照搬，不去区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原则区别。于是他们就根据这种观点，提出要向党向人民政权争民主。学生受了这种煽动就上街，向共产党向人民政府要民主，自由，人